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身體史學的反身思考(2/2)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2-H-029-002-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計畫主持人：黃金麟

報告類型：完整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12 日

在過去的兩年中，本研究除了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與閱讀外，也將身體史學的分析進路和力道表現在《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身體，1928-1937》(台北：聯經，2005)的修改和出版上。另外，按照計畫書的進度，我也針對日治以後台灣身體經歷的軍事教化進行初步撰寫。在這份期末報告中，我將以《政體與身體》的部份內容，和日治以後台灣身體經歷的部分演變，特別是戰爭與身體的變動關聯，說明我對身體史學的反身觀看。更詳細的討論已具體呈顯在《政體與身體》一書，和未來將出版的關於台灣身體建構的專書中。

## 一、身體與政體

以身體做為線索來討論蘇維埃的革命，我在乎的不是政權的更迭與階級關係的更動。這個一般以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來稱呼的動作，不是這裡要討論的課題。雖然在一般的革命研究中，政權的更替和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以及社會剝削關係如何因為革命的誕生而產生實質改變，經常是這些論述的主要內容，但這種以政治權力和階級關係為焦點的討論並不是我想要遵循的取徑。這個方向的修正無意否認政權的誕生和階級關係的改變，通常都以大規模掠奪個人身體做為發展條件，但這些重心的置放卻容易忽略掉，革命對身體的「應然」宣稱，究竟對身體造成甚麼實質影響。而身體的實然存在，又對革命產生甚麼抑止和消磨作用。這些關乎革命發展與成敗的因素，是討論革命時不能忽略的因素。這個看重沒有否認革命的發生和演變，還牽涉到許多結構性、外在性與國際性的原因存在。在本研究的討論中，我將盡量把這些因素擺置在革命的進程中來陳述，並顯現它們對身體的牽制和影響。

如果說革命的發生必然隱含一個「應然」與「實然」的宣稱，甚至它本身就是「應然」對「實然」的強制與凌駕，我們顯然必須面對一個問題，那就是為甚麼有些人會選擇走上革命之路，有些人卻從中逃逸？這個問題其實不會有一致的答案，而每個人也不見得只以一種理由來決定自己的路向。走向革命或拒絕革命，在不同的個人、團體或階級身上，都有不同的理由和考量。這裡並沒有共同

的標準 - 如馬克思所宣稱的階級利益 - 可以做為最後判準。而「應然」也不見得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標準。我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想打破一個迷思，即一般認為社會革命比政治革命來得具有群眾基礎和群眾跟從性，而且這種跟從性還可以用階級來區隔和名稱之。當然，就革命的發生來說，被革命者(如地主與布爾喬亞階級)通常會因為既得利益的受損，而反對和拒絕革命。這個現象在各個政治和社會革命中都可以看到。但這種利益與行動的一致，卻不一定會在革命者，和革命者所處在的階級成員身上顯露出來。在利益從來就不是只有一種，而存活的人又陷在各種慾望和想像的交織鞭策下，我們實難假定社會革命必然會因為它的階級屬性，就產生普遍號召力。

因此，比較貼合現實的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一樣，都隱含一定的內聚和離散力量。政權的腐敗和國權的受損，乃至階級剝削關係的惡化和社會不義，都可能增加革命的情緒與道德條件，使革命成為內聚力的延伸。但與此同時，革命的「應然」宣稱和強制排他性格，以及個人的利益考量，也會讓革命隱含離心力。這個正當性的建構和離心力量的發揮，是同時存在在革命的過程中。有些時候，前者甚至還是後者所以出現的原因和條件。因此，在考究革命的開展時，我們不能把眼光只置放在革命的性質和正當性上。在進行因果探查時，我們必須把革命內含的離心條件，以及產生這種離心條件的原因列入考慮，才能對革命有深入瞭解。當然，在做這個考察時，也不能忽略諸多客觀因素對於革命的支持和限制。這個多因的觀察和反化約的分析，是本研究希望達致的目標。

這個對於革命和身體的好奇，沒有暗示革命是造成近代中國身體演變的所有因素。這種推估無疑不符合事實。因為在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出現在歷史舞台前，身體就已經因為現代時間的引用，學校和勞動體制的改變，以及刑律和民律的制定等，而在作息、勞動和權利的伸張上產生一定的改變。現代兵器和軍事訓練方式的引進，以及尚武精神的講究，也讓肉體和紀律產生道德上的聯繫。這個前所未有的發展也是我們在考察近代的身體發展時，必須計及的成份。與此同時，從嚴復以降對於民智和民德的鼓吹，以及新民論述的出現，也讓國民精神和

體能素質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至於女學的講究和天足會對婦女裹腳的批評，更是前革命時期身體改造的主要重點。這些時程不一與散落各處的發展，說明身體與革命的交互影響其實是十分晚近的事。它不是長期或普遍存在於中國的歷史現象。

也在於身體有著早於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變化，因此在考慮革命與身體的關聯時，就不能忽略既有身體發展對於革命可能產生的刺激和牽制。特別當革命是以激烈手段來改變既有秩序與生活方式時，它所造成的身體衝擊就更值得注意。當然，在強調這些歷史變革時，也不能忽略身體的生物成份對於革命可能產生的強化或反作用。這個雙面的影響是我們必須加以留意的發展。這裡我要陳明的是，蘇維埃革命雖然因為它的階級革命屬性，使它不能把既有的，特別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引進的思想、學制、法律和勞動體系，當做是既成的體系來對待，甚至這些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遺跡，以及資本主義的國家形式和生產關係，就是它要推翻的對象。不過在做這番考究時，我們也必須注意，蘇維埃革命並不是以全面否定的態度來面對既有的身體生成。例如，它雖然批判資本主義對個體身體的剝奪，卻毫無保留地沿用鐘點時間，並使其成為各種學習、勞動和軍事操演的時間計算方式。這種對身體的時間治理，就是複製自資本主義的身體管理方式。另外，它對婦女身體的解放講求和對人民身體的紀律要求，也因為革命的需要而有徹底的表現。這些延續的發展和對身體的紀律化操控，雖然沒有降低蘇維埃革命做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形式，卻讓我們必須以謹慎的態度來面對革命與身體的關聯發展。

在約略討論身體的近代發展與建構論的盲點後，我將把焦點置放在對蘇維埃革命的檢討上。與其他以解放為名的革命相似的是，蘇維埃革命也面對一個內在的善意難題。這個從馬克思鼓吹無產階級革命就存在的問題，並沒有隨著革命偉人的消逝，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出現就聲銷跡匿，反而因為革命的進行變得棘手難解。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解放一旦成為革命的道德基礎，這個「人回歸人，人成為人」的訴求就會變成革命的最後目的。相對產生的，則是對異化勞動和剩

餘價值分配關係的挑戰。這個階級解放的立場讓馬克思可以宣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政治統治，皆為非人化的歷史過程，因此必須加以否定和推翻。置諸到個體的層面上，這個否定將以個體的自由，或者說去除異化和物化的狀態，做為實踐的對象。這個道德訴求無疑具有一定的善意。然而，弔詭的是，解放的實踐也必須以人的工具化做為條件才能實現。這種身體的政治調動和經濟使用，在無產階級的革命中幾乎是歷歷可見。它的發生和顯露的操控，讓解放變成一個矛盾的過程。在蘇維埃的革命中，這種善意的弔詭幾乎與革命的發展同始終。它甚至也是各種暴力，如對地主與富農的清算，對貧農和僱農的徵發等，所以師出有名的原因。共產黨人或許能夠以「必要的過渡階段」來名稱這種矛盾，但它所顯露的悖離卻如影隨形地跟著革命而存在，甚至侵蝕革命的理想。

以身體做為思考和分析主軸，可以讓我們對歷史有不同於以往的認識。最明顯的是，除了將人擺回歷史來觀看外，它的關聯思考也可以把原來屬於散落，甚至被不同學科所佔據和割裂的歷史重新連結在一起。這個走脫學科本位和分析的努力，可以讓我們不再以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學科分際，來切割和觀看歷史。這個跨視界的思維和疆界破除，是浮現新討論必要的過程。當然，把身體當做分析範疇，需要一些概念和策略配合才能進行，而且這部份也不能經由類型學的分析來進行。類型學的討論可以讓我們在功能或行動的層面，理解身體與社會的關聯，或者身體與個體行動的關聯。Bryan Turner 和 Arthur Frank 對身體進行的類型劃分，已經顯現這種理念類型建構具有的分析力道。這些站在社會或個人層次上的分析，雖然昭示出身體的多樣性，卻無法彰顯出身體與社會的動態發展關聯。在凍結歷史脈絡的情況下，我們無法看到身體的現實遭遇，和歷史如何因為身體的諸般運作和抗拒，而產生未預計的結果。這個交互發展和造就的結果，只有緊扣歷史才能理解，而這也是我們必須對建構論的立場，即身體是社會建構的一個過程和結果，抱持謹慎態度的原因。這個聲稱沒有否認身體的社會建構面向。但在承認這個建構成份時，也不能忽略身體的生物需求和自然慾望 - 這些被建構論排除的成份 - 對社會建構產生的抵制和修正作用。這個

拉鋸過程和產生這個拉鋸的原因，將提供我們一個認識蘇維埃革命的新進路。

當然，以身體的存在和遭遇來觀看歷史，它的解釋能力必須受到謹慎對待。因為不是所有的歷史都可以透過身體來解釋，也不是所有的歷史事件和趨勢 (conjunctures) 都以身體做為發生條件。這個關聯性是身體研究，特別身體史學，必須具有的警覺。提出身體的流動特質主要是讓我們意識到，身體與歷史的流變一直是處在互為因果的關係中。兩者之間並沒有誰必然為因，誰必然為果的順序。事實上，沒有身體的行動和慾念投入，歷史將變成沒有意義的過程。這就好像沒有歷史的先行存在和現實圍限，身體的動能和抗拒將無從展現一樣。兩者都不能缺少對方而獨立存在。這個互為因果的問題是討論身體流變時，不能忽略的課題。而從蘇維埃的革命過程中，我們也將看到這場為時十年的革命，究竟對身體產生甚麼干預和影響。這個交錯著解放、干預和反抗的歷程，清楚表現革命與身體，或者說，歷史與身體的關聯究竟如何。

## 二、戰爭與身體

要考究台灣的軍事身體教化，我們除了必須知道國民黨的軍事教練和知識操作，如何在 1945 年後支配台灣的身體外，也必須對 1945 年以前，台灣身體經歷的軍事教養與戰爭動員有對應的掌握。因為，從 1937 年開始，隨著蘆溝橋事變的發生和隨軍軍夫、軍屬的徵調，台灣的青年和少年就面對前所未有的軍事調動和身體訓練要求。這種因為戰爭而引起的變化，到 1941 年後更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和 1944 年的要塞化台灣動作，而變成經常性的舉動。這些連番和密集的訓練說明，1950 年出現在師範體系中的軍訓教育，和 1952 年實施於高中以上學校的軍訓和軍事管理，並不是國民黨來到台灣後才出現的創舉。早在國民黨決定實施軍事教育和半軍事教育(如童子軍)於各級學校以前，台灣的青年和少年就已經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教導下，成為知戰和能戰的「國民」。國民黨只是在既有的軌道上調整和發揚這個遺業而已。這個既有的常態教養是國民黨能夠在台灣實施軍訓教育，而不致引起激烈反抗的原因。以系譜學的角度來說，它也是武化身體

出現在台灣的開端。審度日本的軍國主義教育和國民黨的軍訓教育，兩者的系出同源和其間存在的襲取關係，也說明 1945 年後的清除皇民化動作並沒有包括軍事化的部份。這個綿延和持續的發展是我們要探討的部份。

在思索台灣的軍事身體建構時，我們首先面對的問題是，這個充滿現代性色彩的身體鍛鍊究竟起自何時？它的出現和造成的內化效應 - 一種以當兵為榮，不能當兵為恥的認知，如何影響個體的身體發展？相較於二十世紀初葉後出現在歐亞地區的軍事化國民動作，日本的殖民台灣和把台民視為帝國武力的後備部隊，它的國防經濟邏輯如何落實在個體身體的教養上？這種因為戰爭需要而產生的實踐，怎樣讓身體變成國家需要面對的另外戰場，甚至構作出特定的身體生產機制？這個歷史成績的形成和造成的身體效應，清楚表現在 1930-40 年代台灣青年的身上。

對中國和台灣而言，1895 年都是一個關鍵的年份。不過相較於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的練兵和開啟的現代軍事教養先河，台灣青年卻因為甲午戰爭的發生而整整晚了四十二年，才接觸到現代的軍事作戰技藝。這個時間落差自然和日本的區隔內地人與本島人，以及避免本島人習得作戰技藝，以對抗日本殖民政權有直接關係。這個知識和技藝的禁制清楚表現在兵役的免除和作戰技藝的禁止教導上。1917 年的公學校體操教授要目雖然規定有教練(即兵式體操)的科目，但這些以徒手分隊、行進和踏步為主的訓練，還是以身體各部份的均齊發展和機敏健康做為主要目的。1927 年台灣總督府所公佈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也是以身體的日常訓練和規律發展做為訴求。「內地延長主義」的教育政策在這裡遠比戰爭的要求，具有政策施展的合理性。這個事實說明，在 1937 年以前，去軍事化一直是日本殖民政府的教育底線。兵式體操只是做為涵養國民性格，同化台灣人為日本人的門徑而已。它的出現必須被置放在內地延長主義的框架中來觀看。

相對於之前的去軍事化動作，日本治台的最後八年(1937-1945)，軍事的訓練和徵調幾乎成為台灣軍和台灣總督府最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而且，隨著中國戰局的擴張和太平洋戰場的增加，這種軍事人力的需索也變成一個無底的坑洞。不

過，不同於日本內地的是，台灣的殖民地身分讓它在參與這場總體戰時，一直是處在邊陲和相對被動的狀態。甚至在參與戰爭時，也不是從軍事人力的大量動員開始，而是從經濟支援和後勤補給的位置參與日本的對華戰爭。這種物資先行的發展除了和之前的去軍事化動作有關外，台灣人的不具備皇國臣民義務，特別是服兵役的義務，與漢人的血緣背景，也讓這種邊陲待遇變得理所當然。在不能徵調台灣人充當兵士，派赴中國戰場作戰的情況下，總督府只能以 1937 年日本政府頒佈的國家總動員法，來統合台灣的物資與勞力，形成一個因應戰局需要的統制經濟安排。除了軍需工業的發展外，各種勞務的徵集、安排和調用也成為總督府的重要工作。也是在這個背景下，總督府開始透過庄役場的職員和派出所的巡查，徵集台灣的勞動力以為台灣軍使用。這個動作從蘆溝橋事變後的兩個月就開始。這個以軍夫為名的徵集，開啟了往後八年台灣人接受軍事訓練的大門。

這種時勢使然的變化顯示，台灣成為日本對外戰爭的動員對象，甚至形成全民防衛作戰的體制，深受大東亞戰爭的需要影響。台灣並不是一開頭就成為日本全力動員的對象。它在大東亞戰爭中具有戰略位置 - 即做為克制中國和南進南洋的跳板，是在 1941 年年中日本軍方決定進攻南洋後才形成。也從此時開始，它取得日本軍部一直不願賦予的總體戰成員位置。這種成為帝國戰爭成員的變化，除了和戰局的擴張與人力的耗損有關外，也和台灣民眾爭取平等的國民位置有直接關係。因為相較於日本統治下的朝鮮，台灣晚了三年才取得為天皇服兵役的「絕對至高的國民榮譽」。然而，這種從邊際躍升成為南進的中心點，也改變了台灣人對軍事生活和知識的陌生。除了做為帝國經濟的中繼補給站，使南方的原料得以運到相對工業化的台灣來進行加工生產，然後北運到日本，南運到各派遣軍的補給站進行軍事補給外，日本在台灣的多多年經營也讓它成為訓練和整補南方軍政要員的中心。不過，更根本的改變則是，台灣青年開始成為日本軍部企圖支使和訓練的對象。

有趣的是，1945 年的終戰宣告並沒有結束日本在台灣軍事影響力。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失勢與重建軍事武力的需要，蔣介石決定聘請昔日的敵人做為建



軍備戰和反攻大陸的助手。這個以「白團」為名的軍事顧問團從 1949 年後，就成為蔣介石訓練將、校級幹部和中下層軍官的倚恃力量。<sup>1</sup>透過 83 位日本將校級顧問的協助，圓山軍官訓練團成為傳授戰術、情報、後勤、工兵和通信的最重要知識場域。與此同時，顧問團也將太平洋戰爭時期發展出來的「島嶼作戰教令」，當做是重要的教材，教導台灣軍隊登陸和反登陸作戰的要領。除此之外，顧問團也按照日軍遺落在華北的「軍動員計畫令」，草擬出符合台灣動員需要的計畫書，並從 1952-1959 年為止接續訓練 9,330 人擔任動員幹部。<sup>2</sup>在成立師管區和團管區的編制後，將台灣的人力、軍需和車輛均編制入戰時動員的結構中，成為總動員作戰的徵召對象。這些創舉從此成為台灣軍事動員的依循規則。1952 年美軍軍事顧問團的進駐台灣，雖然壓縮白團的公開活動空間，和迫使部份的白團成員陸續離台，但直到 1968 年白團結束在台灣訓練任務前，它都是蔣介石最得力的軍事助手。台灣徵兵體制的建立和動員制度的實施，都完成於白團的建議和操練。這個延續的事實說明，1945 年不是兩個時代的絕對分界點，在軍事訓練和動員的場域中，並不存在論述和非論述層次的斷裂。更重要的是，白團成員多出身自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大學，他們的軍事思想直接傳承自明治時期的德國兵學。這種綿延不絕的發展是考察台灣的兵制和訓練時，必須謹慎對待的部份。

在無意貶低 1945 年的符號性意義的前提下，我希望透過軍事教養的線索捉摸，體現出歷史發展的連續和深邃面貌。這個討論沒有否認皇民化與中國化的認同要求，對台灣人造成的認知和情緒困擾。畢竟，日本曾經是許多年輕學子認知裡的祖國。它的份量不會比回歸後的祖國 - 中國 - 來得清淡多少。另外，陳儀的壟斷性接收，也讓政治和經濟上處於劣勢的台灣人無法透過回歸的過程，獲得心

---

<sup>1</sup> 除了直接訓練 5,968 名中、上級軍事將校外，連同三十二師官兵的實戰訓練，白團在二十年中訓練了超過兩萬名的官兵。1950 年後執掌台灣重要軍事職務(如參謀總長、國防部長、陸軍和海軍總司令等)的將領，幾乎都受過白團的兵學訓練。有關白團的成員介紹和發展起落，見林照真，《覆面部隊 - 日本白團在台秘史》的採訪記述。

<sup>2</sup> 楊碧川，《蔣介石的影子兵團 - 白團物語》(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 134-135。

裡預期的平等和尊嚴。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不平等依舊存在的狀態下，回歸的現實意義究竟何在，也變成有待檢證的問題。在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兩頭落空的情況下，二二八事變的發生只是讓「祖國」變成一個更為沈重的政治符號。不過，這種激烈的政治的變化，並不代表歷史就此斷裂。畢竟，殖民政府同化政策的終結和行政長官公署實施的民族主義教育，並沒有構成論述領域的全面更張，更遑論論述領域之外的歷史發展。如何在皇民化與中國化的認同變化之外，發覺更多的歷史面貌，形成反身性的觀察和省視，是歷史研究必須繼續努力的路向。

扣緊身體做為反身思考軍事體制和軍事訓練的出發點，不但可以彰顯軍事知識和技藝作用於人身的過程和結果，同時，也可以凸顯國家的個性和角色怎樣透過現代戰爭技藝的搭配，落實在對個體身體的要求上。而且，這種片面的效果講究和道德要求，不應該被視為是歷史的必然，也不是人類必然的宿命。它只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產物。從去軍事化到軍事化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清楚顯現這種人為構作的成份和其間存在的政治意涵。當然，也從戰爭的進行過程中，我們看到軍事做為一種政治治理的過程，是怎樣隨著戰爭情勢的變化而產生實質的改變。這種因應戰爭而進行的準備，後來又怎樣成為國家治理人民的常態性技藝。這種因果相循的發展，讓軍事和政治再難處在分立的兩端。軍事不只是一種戰爭的技藝，同時也是一種統治的技藝。總動員作戰的形成和軍政權國家的建立，就需要兩者的同時到位。1949年之後的台灣，就是在這種將軍事當做統治技藝過程中顛簸前進。反攻復國戰爭的宣稱和執行，讓我們清楚看到戰爭與社會變遷的緊密關係，以及戰爭技藝對社會形構的深切影響。這種非常態情境的常態化發展，是這個研究要繼續挖掘的問題。也從這些相關的經驗討論中，我們看到身體史學能夠著墨和探討的課題，的確與傳統史學關注的面向有所不同，它的推陳出新是值得繼續關注的特點。